

■玉渊杂谭

因为著名娱乐主持人一句低水平的玩笑,汉服复兴这一话题似乎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度。虽然如此开场引起了各方争论甚至上升到民族主义未免显得有点低端,但有思考总比不思考强。这些年来,汉服复兴运动在民间可谓颇具规模,常能从新闻图片中看到许多或集体或单独着汉服的年轻人。

我从来就不喜欢海派小情调的脱口秀,相比于喝咖啡,还是喜欢吃大蒜来得豪爽大气。不过我倒觉得“洗浴中心说”

虽然戏谑,却歪打正着地说中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年进入公众视野的所谓“重拾汉家衣冠”,确实有一部分让人觉得不得要领,缺乏神髓。例如个别穿着汉服者出现在地铁里,定会被视为行为艺术而引起围观。又或者在仿古建筑下举行的集体着汉服祭祀仪式,“山寨”两个字也会不自觉地冒出来,因为我所看到的画面确实还不如三流古装剧的龙套场面和谐。

正是受许多粗糙的古装剧,以及影楼

和旅游景点古装拍照道具的影响,多数人对汉服并没有准确的认识。在这种环境下,“穿”的人表现为过度文艺化,“看”的人表现为过度娱乐化,因而在娱乐节目里发生“汉服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可惜汉服不是舞台装,也不是用窗帘布就能做成的,正所谓“穿起龙袍也不像太子”,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还真不是现在随便一个中华儿女就能hold住的。

汉服本身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深衣、襦裙;交领、对襟、曲裾、直裾……历朝历

代的服饰在形制、用料上皆有讲究,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元素。汉服上不仅沉淀了各个时期的制衣样式,还记载了汉民族文化的演进历程。如果对传统文化无甚了解,不具备些许士大夫的气质,那穿起广袖褒衣来,自然像极了影视基地里的群众演员。

巴故的汉服运动前辈溪山琴况认为,汉服的复兴,应当是重塑一群更加拥有独立精神和自主思考能力的人;塑造一群拥有世界级文化大国气度和自信

文·杨雪

的国民;撑起强势崛起的民间力量,实现中国前所未有的民间的文明觉醒。从这一意义上看,汉服复兴的精神内核本不在“穿”。

就好像西欧民族一直保持的“绅士风度”,他们今日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重视,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妇女的尊重,以及所崇尚精神理想,与是否穿着宫廷礼服或者骑士铠甲无关。源自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已经从服装渗入民族血液和骨髓。

■桂下漫笔

七月是招生季,今年最吸睛的事件之一就是清华和北大抢生源战火纷飞,这不禁让我想起清华的老校长罗家伦先生。或许对不少人来说,罗家伦这个名字已有些陌生了。但我们既然说到大学招生,就不能不提到他。1928年9月,三十出头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上任伊始,罗校长就在招生问题上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招生男女平等,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从今年起,决定招收女生。男女教育要平等的。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清华的学生太少,以至于教学成本竟为北大之四倍。在他看来,以清华当时的基础,再对图书与学生宿舍等加以扩充,当可容纳学生一千人,而清华实际在校人数却不过300多人,因此,以后每年添招百人,以充分利用清华设备培养人才。当时,清华招生工作已结束,录取了新生90余人。在罗家伦“添招”政策下,又补招20多人。次年,清华大学逐年扩招,到1932年梅贻琦校长增设工学院时,仅新生人数就增至300多人。不过,罗家伦的“添招”与今日大学“扩招”不同。罗校长心中没有教育产业化这道魔咒,多招学生是为了让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现代素养,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树立文化根基。就像他曾说过的,“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

第三把“火”,大学校门“严进严出”。罗家伦说,“我希望以后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罗家伦治下的清华虽实行“添招”,但招生增速赶不上考生增长,新生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率却从1928年的23.1%降到了1936年8.2%。而且,当年的清华教学要求严格,学生课业繁重,淘汰率很高,因无法应付功课而请求休学,或因功课或品行问题而被退学的人数占到学生总

大学的“面子”与“里子”

额的15%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把进校的大门开得更宽,出校的门槛提得更高的同时,死死地堵住了见不得光的“条子”和“后门”,把清华招生史上一度出现过的权贵子弟“特招生”、靠捐款入学的富家子“自费生”拒之门外。

1931年,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并担任中大校长直至1941年。和现在一些名校竞相“掐尖”恰恰相反,当时多所名校实行“联合招生”。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罗家伦这样的校领导看来,办大学的根本不在求门面光鲜,而是要正处战乱中的国家增添足以抗衡外辱的力量。他说,“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与一般学术,抵

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或者说,校长如罗家伦者,看重的是学校的“里子”而不是“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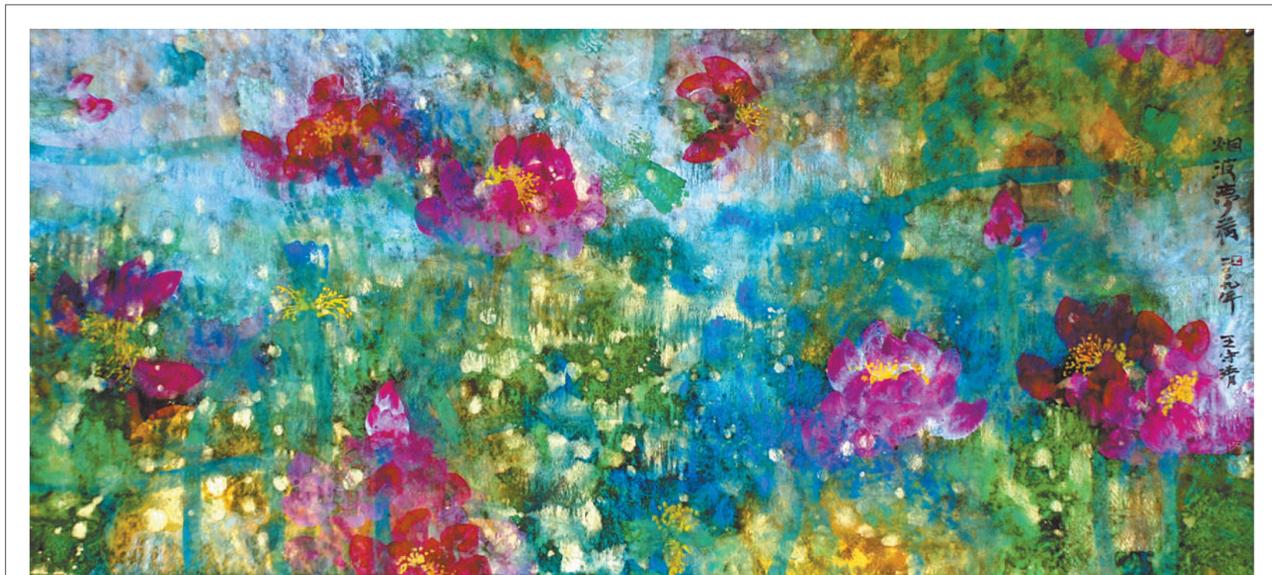
1937年8月19日,罗家伦参加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三校联合招生委员会工作会议,因天气炎热,会议从早上六点一直开到下午六点还没有结束,老师们决定吃完晚饭再继续开。比天热更糟糕的是侵华日军大轰炸,仅这天中午就有两次空袭,但老师们不为所惧,继续开会,不料会还没有开完,敌机又到屋顶盘旋,于是,在警卫队长带领下,大家转移到图书馆的地下室继续开会。据罗家伦回忆,来到地下室后,“我正按着扶手椅的两柄,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开会;忽听砰然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的打下,房子向两边摇摆。以后继续的几十声,有如天崩

地塌。我们知道本校受炸了。炸后又有五分钟不断的清脆爆炸声。那时候校警来报告科学馆后面的房屋起火了。我们不能等敌机离开上空,一齐出来救火……这是敌人对付我们文化机关的狰狞面目!但是这种狰狞的面目,吓我们不了。我们于救火完毕以后,还继续开会约十分钟,将招生事件结束,各校代表将新生成绩单,分带回校。”

很遗憾,我没有查到这次别具一格的招生会议的详细会议记录,无法再现三校招生老师在敌机狞笑中为国选材的场景,我想,出于招生需要,他们或许会对录取名额多少、是否录取某个学生发生争论,但绝对不会为抢得几个“状元”、争得一份所谓的“面子”或“政绩”而勾心斗角,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文·胡一峰

网络热词——“公主病”,据说患此病者自恋倾向严重、自我评价失衡、过高,在任何场合都希望得到公主般的待遇。典型病例是《天空八部》里的马夫人,为把天下好男人收入裙下,不择手段。其实,正所谓人以群聚,同气相求,用什么方式招揽人,往往决定了招揽来的是什么样的人。马夫人专以色、利诱人,吸引的只能是白世镜之类贪财好色之徒,面对真正的好男人萧峰就束手无策了。大学招生也是如此,以治学水平、育人理想求天下英才,招来的才是真心求学、有抱负的好青年,如果专靠金钱、浮名或各种所谓“优惠政策”利诱,难免吸引来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长此以往,败坏一所所大学的名誉且事小,败坏了世风人心却是事大,这难道不值得某些大学深思吗?



夏荷(油画)

王守清(中国香港)

■人物纪事

锦瑟无端

——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



在很多人眼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之一。作家是在普法战争后的第二年(1871)7月10日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之家的。他9岁患上哮喘,从此疾病缠身直到51岁病逝。可以说,疾病毁了他作为平凡人的一生,疾病也成就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生。普鲁斯特的细腻和敏感很大一部分来自疾病的刺激,他说:“只有病痛能叫人有所发现,叫人学到东西,使人能对各种机制进行分解。没有病痛,人就体会不到这些。”

1882—1889年,普鲁斯特就读于巴黎贵族学校贡多塞中学。这所中学充满了文学气息,是法国十九世纪大文豪圣伯夫、泰

纳和龚古尔兄弟的母校。中学期间,他结交了一帮上流社会的少男少女,步入贵族圈子。由于健康不佳又家境富裕,普鲁斯特大学毕业后没有参加工作,他一生都没有投入过什么职业生涯,只是整天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算得一个“富贵闲人”。假如没有成为作家,他无非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罢了。但是,普鲁斯特的那些出入沙龙的时光并非虚掷,他如蜜蜂采蜜一样,沙龙里见到的人物和情形都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在创作道路上,普鲁斯特并非一帆风顺,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但直到四十来岁才取得成绩。他的作品并不多。1896

年出版的《欢乐与时日》(又译《悠游卒录》)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收入了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人物速写、景物描写等篇什。这部处女作显示了作家杰出的写作才能,但难免失于幼稚和做作,加之装帧低劣,出版之后反响不佳。大约在1896—1904年之间,他着手创作一部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依》,小说没有完稿,生前也没有发表,直到1952年作家去世三十年之后,才整理出版。普鲁斯特还有一部作品《驳圣伯夫》,写于1908年,也是1954年才出版的。此外,1919年,他出版过一本文集《拟作与杂记》。

应该说,普鲁斯特的上述作品,无论是生前出版的,还是身后出版的,都只是一种“练笔”——这是一个伟大作家在积蓄、探索、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康庄大道。今天,我们去读这些作品,仿佛是在聆听一部交响乐的前奏,真正的动人心魄的交响乐是他的煌煌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共七卷,法文三千多万页,中译本超过200万字。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只有上述艺术练笔其实还不够,还需要思想的修炼和人生的阅历。1900—1903年间,普鲁斯特翻译了美国美学家罗斯金的许多作品,罗斯金的美学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也经历了人生的变故:1903年

和1905年,父母双亲先后去世。他痛苦极了,悔恨自己没有写成优秀的作品,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尤其大,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母亲的死使他失去了童年的天堂。现在重新创造这个天堂的时刻已经来临。”

1906年起,普鲁斯特的哮喘病严重起来,一开始他还能出门去海边度假,后来一点点花香的气息或者外界的噪音都能诱发疾病。从1910年起,他已不能出门。在住所里,他用软木和厚毯子将四壁遮挡,以降低外界噪音的干扰;窗户紧闭,以防止户外花草树木的气味进入;家里不许做饭,因为他受不了烧柴的烟味;连仆人的饭食,也由附近餐馆送来。此后的十几年里,普鲁斯特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比作在诺亚方舟里避难的诺亚。“在我幼小的时候,我觉得圣书中任何人物的命运都没有像诺亚那样悲惨。他因洪水泛滥,不得不在方舟里度过四十天。后来,我时常患病,也迫不得已成年累月地呆在‘方舟’里过活。这时我才明白,仅管诺亚的方舟紧闭着,茫茫黑夜锁住了大地,但是诺亚从方舟里看世界是最透彻不过的了。”普鲁斯特就是在他的方舟里,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

1913年小说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在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自费在一个小

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普鲁斯特42岁。随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先的出版计划搁浅。从1914年到1922年去世,普鲁斯特在不断加工和修改这部作品,小说失去了童年的天堂。现在重新创造这个天堂的时刻已经来临。”

1922年10月,普鲁斯特突发支气管炎,进入11月病情加重。11月18日下午4时,这个一直被疾病折磨的作家去世了——就在去世当天凌晨3点多,他还在口授进行创作。《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三卷,普鲁斯特生前已经定稿,他去世后,由弟弟代为整理出版:1923年,第五卷《女囚》出版;1925年,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出版;1927年,在小说第一卷出版14年之后,最后一卷《寻回的时光》也问世了——从此,世界文学中又多了一部不朽之作。

文·杨富波

